

明末奉教天文學家鄔明著事迹鉤沉*

董少新

提要：鄔明著是徐光啓所組建之曆局中的骨幹成員，對修成《崇禎曆書》發揮了重要作用。領洗入教後，信仰虔誠，並將天主教傳入其家鄉武昌，促成湖廣開教。然因相關文獻甚少，致其事迹不顯。本文通過現存中文及葡萄牙文文獻，勾勒鄔明著修曆與奉教事迹，進而凸顯曆局成員所構成的天主教人脈網絡及其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作用。

關鍵詞：鄔明著 《崇禎曆書》 天主教徒 武昌開教

一 引 言

崇禎二年(1629)五月，徐光啓奏請采用西法修訂已沿用近二

* 本文乃復旦大學“985 工程”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文史研究院研究項目(EYH3801004)、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KRH3801001)及復旦大學亞洲中心項目資助成果，特此致謝。

百六十年之大統曆,七月奉旨督領修曆,在宣武門內舊首善書院建立曆局(即西局),九月曆局正式開始運作。^①數年間成書百餘卷,^②彙成《崇禎曆書》,然因明亡而未得頒行,入清後湯若望更其名爲《西洋新法曆書》進呈,終獲頒佈。《崇禎曆書》是西方天文學的百科全書,是明末西學東漸的主要內容,對中國天文學、曆法有深遠影響。

潘朔先生評價《崇禎曆書》云:“取十六世紀與十七世紀初的西方天文學,譯西爲中,卷帙浩繁,是曆局人員與傳教士同心協力、共同努力的巨大成果。做出貢獻的人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徐光啓、羅雅谷(Jacques Rho, 1593—1638)和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三人,其次可推李天經、龍華民(Niccoló Longobardi, 1565—1655)、鄧玉函(Jean Terrenz, 1576—1630)、陳于階、鄔明著等五人。此外,可列入名單的約有五十人左右。”^③所舉八人之中,西洋與中國各四人,羅、湯、龍、鄧爲著名的來華耶穌會士,其事迹已爲學界所熟知;至於徐、李、陳三人,亦多有研究,^④惟鄔明著向無傳記問世,致其生平事迹不顯。

① 朱維鈺、李天綱主編《徐光啓全集》(9)《徐光啓詩文集》卷四《修改曆法請訪用湯若望羅雅谷疏》(崇禎三年五月十六日),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68。

② 由於原本不存,至今仍不清楚《崇禎曆書》究竟有多少卷。徐光啓、李天經先後五次進呈曆書共計一百三十七卷,各家著錄有一百二十六卷、一百三十二卷等數目;而據《1637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曆局已翻譯曆書一百四十餘卷。潘朔《崇禎曆書·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9年,頁28(本文所引《崇禎曆書》及《西洋新法曆書》中之內容,均使用此版本);Biblioteca da Ajuda(里斯本阿儒達圖書館,以下簡稱BA),*Jesuitas na Ásia*(《耶穌會士在亞洲》,以下簡稱JA),49-V-12,fl. 13。

③ 潘朔《崇禎曆書·前言》,頁28。

④ 有關李天經、陳于階的研究,如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7年,頁173—176,239—243;陳垣《明末殉國者陳于階傳》,見《陳垣學術論文集》(一),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249—254。

現存有關鄔明著的資料甚少,中文方面僅《崇禎曆書》中載其名,葡萄牙文資料中則有數條言其信仰。本文以這兩類資料爲基礎,勾勒鄔明著修曆與奉教事迹,進而凸顯曆局成員所構成的天主教網絡及其對天主教在華傳播的作用。

二 鄔明著與《崇禎曆書》

鄔明著是湖廣省武昌縣人,^①字、號及生卒年均不詳。有一弟名鄔明昌,字期仲,號峒菴,崇禎十年(1637)進士(三甲第六十一名),^②授錢塘知縣,康熙《錢塘縣志》、雍正《浙江通志》等書中有傳。^③

崇禎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鄔明著以生員身份入局供事。^④徐光啓初籌曆局,求賢若渴,在選拔修曆人才時提出:“通行各省直,不拘官吏生儒、草澤布衣,但有通曉曆法者,具文前來。”^⑤這解釋了出生武昌、位階低微的鄔明著何以能被招入北京的原因。

徐光啓招募修曆人員有嚴格標準:“即明曆者亦不必遽行起送,先取其著述文字,並令豫算交食凌犯數條,或製造儀器式樣,並申到部查核,果有裨益,方行取用,庶真材得以自見,而曠鼎濫竽無能雜進矣。”^⑥從欽天監中考取的人員,必須“心手精敏、能善書算

① 湯若望所撰《見界總星圖解》後署有“楚壽昌後學鄔明著圖”,壽昌即武昌。《崇禎曆書》,頁1535。

②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2615。

③ (康熙)《錢塘縣志》卷一六,清康熙刊本,頁5;(雍正)《浙江通志》卷一四九,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56。

④ 《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27上。

⑤ 《徐光啓全集》(9)《徐光啓詩文集》卷四《禮部爲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崇禎二年七月十一日),頁155。

⑥ 同上書。

者,不得過十五人”,而從民間訪求的知曆人等,“必須心精手巧,確當一臂之用者,不得過十人”。^① 隨後徐光啓再次明確選取徵用知曆人的三個等級:“其一,能明度數本原講解意義傳教官生者;其一,測驗推步精密不差者;其一,製造大小儀器工巧合法者。”^② 鄒明著得以入選,說明其在測驗推步或製造儀器等方面已具有一定基礎。

明代嚴禁私習天文曆法,致民間少有能專此科者。但徐光啓將“天文”與“曆法”嚴加區分,認為“蓋天文占候之宜禁者,懼妄言禍福,惑世誣人也。若曆法則止於敬授人時而已,豈律例所禁哉!”^③ 由於史料失載,我們無法知道鄒明著入局前研習曆法之經歷,惟其所專者,似與占卜吉凶一類無涉,否則難以入選。值得注意的是,占卜吉凶亦為天主教所禁,來華傳教士斥其為迷信。^④

在鄒明著之前,已有陳于階(崇禎二年八月)、張竈臣(二年九月)、祝懋元(三年七月)、董思定(三年八月)應徵入局供事,隨後又有楊之華(四年正月)、李遇春(四年二月)、黃國泰(四年七月)、程廷瑞(四年十一月)、朱國壽(四年十二月)、黃宏憲(五年八月)、魏邦綸(在局一年)、孟履吉(五年九月)等人陸續加入。^⑤ 這批人在徐光啓的領導下,跟隨鄧玉函(三年四月去世)、羅雅谷(三年七

月入局)和湯若望(三年十一月入局)學習西法。^① 入清後湯若望將《崇禎曆書》改名為《西洋新法曆書》,並將其中所有參與各書、各卷工作的知曆人均稱為“門人”。考慮到這批中國人的確在傳教士的指導下學習曆算知識,這樣的改動也不為過。在掌握了基本的西洋曆算知識後,這批知曆人便參與到具體的翻譯西方天文學著作,實地觀測,計算,預測日食、月食及五星凌犯等工作之中。

鄒明著入局以後,參與了多數具體修曆工作,表現出色,為曆局骨幹之一。從現存文獻來看,鄒明著參與的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幾種:一是計算。《崇禎曆書》中有《交食表》九卷,其中卷一、六、九署有鄒明著之名;又有《恒星曆指》、《恒星出沒表》、《五緯曆指》之“土星”、《日躔曆指》、《日躔表》、《月離曆指》、《月離表》、《測量全義》卷五均署有鄒明著“算”、“覆算”或“全算”。^②

二是觀測,《崇禎曆書》中的《恒星經緯圖說》和《恒星經緯表》署有鄒明著“全測”或“同測”。^③ 崇禎七年(1634)鄒明著曾與朱光大奉命前往山海關實地觀測該年八月十六日之月食,同時陳于階和朱國壽亦往登州觀測,^④ 此舉被方豪稱之為“實我國第一次結對觀測月食”。^⑤ 而在北京觀象臺觀測天象,更是鄒明著的例行工作,如崇禎八年李天經率羅雅谷、湯若望、王應遴、陳應登、鄒明著

① 《徐光啓全集》(9)《徐光啓詩文集》卷四《禮部為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崇禎二年七月十一日),頁156。

② 同上書《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崇禎二年九月二十三日),頁166。

③ 應注意的是,徐光啓這裏提到的“天文”與我們現在所說的天文學意義不同。同上書《禮部為奉旨修改曆法開列事宜乞裁疏》(崇禎二年七月十一日),頁155。

④ 但有時傳教士不得不根據形勢需要採取靈活策略,並由此在傳教士內部產生爭論。參見黃一農《探五之爭與康熙曆獄》,《清華學報》(新竹)新第21卷第2期,1991年,頁247—280。

⑤ 《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25下—1627下。

① 周胤、賈良棟、鄒明著等在局學習官生在講述學習經歷時云:“奉命學習,日與西先生探討,不直讀之以書,且試以器,不直承之以耳,且習以手。語語皆真詮,事事有實證。”參見《崇禎曆書·學曆小辯》,頁1792上。

② 祝平一詳細整理了《崇禎曆書》各書、各卷之署名情況,並將其與順治版《西洋新法曆書》作對比。見其《〈崇禎曆書〉考》,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明代研究》第11期,2008年,頁138—158。

③ 祝平一《〈崇禎曆書〉考》,頁138—158。

④ 《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07下—1608上。

⑤ 方豪《中國天主教史人物傳》,頁174。

以及欽天監的官員一起到觀象臺觀測水星，結果新法效驗；崇禎九年正月欽天監、西局以及布衣魏文魁一同測月食，亦以西局預測為準確，該年七月、十一月等多次觀測天象的活動中，鄒明著都有參與。^①

三是校訂，《崇禎曆書》中的《交食曆指》、《交食表》卷七、《古今交食考》、《五緯曆指》之“木星”、《渾天儀說》卷一與卷二、《割圓八線表》均署有鄒明著“參訂”、“全訂”、“較訂”、“閱”或“參”。^②

四是繪圖，崇禎六年曆局完成《見界總星圖》，由徐光啓撰敘，湯若望撰圖說，羅雅谷訂，鄒明著繪圖。崇禎七年七月，李天經命湯若望將此圖製成八面屏障（即《恒星屏障圖》）進呈御覽。^③ 這幅圖被潘耒先生譽為“含古今中外、黃赤兼備的十七世紀世界上最完備的星圖”。^④

此外，在《西洋新法曆書》中，鄒明著之名還被湯若望列入《五緯表》卷一、卷二中，惟不知鄒明著具體負責此書的何種工作；而在《恒星經緯表》和《月離表》中，湯若望又未將鄒明著之名列入，亦不知何故。^⑤

崇禎七年，布衣魏文魁疏言曆官所推交食節氣皆非，未久奉聖旨入京測驗，並成立“東局”，負責以其法修曆。這樣，崇禎朝在治曆方面形成大統、回回、西局和東局四家分門角技的局面，言人人

殊，聚訟紛紜。^① 其中尤以東、西兩局爭論激烈，收入《西洋新法曆書》的《學曆小辯》即是西局與魏文魁爭辯的文獻。作為西局中較重要一員，鄒明著亦參與到與魏文魁的爭辯之中。^②

至崇禎六年，修曆工作已初具規模，年邁的徐光啓自感時日無多，在去世前夕上奏皇帝，一面請求調李天經代己之職，一面懇請嘉獎修曆人員。疏云：

如遠臣羅雅谷、湯若望等，撰譯書表，製造儀器，算測交食躔度，講教監局官生，數年嘔心瀝血，幾於頹禿唇焦，功惠言鉞；但遠臣輩守素學道，不願官職，勞無可酬，惟有量給無礙住房，以為安身養贍之地，不惟後學攸資，而異域歸忠，亦可假此為勸。知曆生員鄒明著、訪舉儒士陳于階等，思精推測，巧擅繪製，書器方藉前勞，講解正需後效，所當照纂修辦事例優鉞者也。知曆人如生員程廷瑞、孫嗣烈、孟履吉，監生李次霽，訪舉儒士楊之華、祝懋元、張窠臣、黃宏憲、董思定、李遇春、趙承恩等，同心績學，殫術承天，十狐之腋堪裘，衆集之思成益，所當照纂修效勞例量鉞者也。原任大理寺評事今帶銜光祿寺錄事王應達、武英殿辦事中書陳應登督率官生，參訂訛正；武舉魏邦繪測算明曉，堪備策使，三臣著聲勤慎，所當同行優鉞者也。其該監官生如右監副戈承科，秋官正周胤，原任五官保章今降充天文生朱國壽，五官保章正劉有慶，中官正賈良棟，候缺保章正賈良琦，博士朱光顯，天文生朱光燦、朱光大等，勤學可嘉，俟學習完日另敘。^③

① 《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48下，1650下，1651下，1662下，1668上，1672上。

② 祝平一《〈崇禎曆書〉考》，頁138—158。

③ 此圖見《崇禎曆書》，頁1537；並參同書，頁1535，1608下—1609上。

④ 潘耒編著《中國古天文圖錄》，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102—103。《恒星屏障圖》影印件亦見於此。

⑤ 祝平一《〈崇禎曆書〉考》，頁144，147—148，152。

① 黃一農《清初欽天監中各民族天文家的權力起伏》，《新史學》第二卷第二期，1991年，頁76。

② 《崇禎曆書·學曆小辯》，頁1792上—1797上。

③ 《徐光啓全集》(9)《徐光啓詩文集》卷五《治曆已有成模懇祈恩敘疏》(崇禎六年十月初六日)，頁246。

徐光啓認為兩位傳教士在修曆工作中是首功，為其爭取房屋田產，則是出於對傳教事業的長期考慮。而鄒明著之功緊隨其後，“思精推測，巧擅繪製”是對其工作表現的概括性評價，因此建議參照“纂修辦事例優敘”。而“知曆生員”的稱謂，相比較於“知曆人”、“訪舉儒士”等，似顯示其西局中的地位相對較高。但徐光啓此疏所提出的優敘建議，卻遲遲未被落實。

西局自成立以來，一直無正式編制，鄒明著、陳于階、程廷瑞等在局人員也無職銜。不僅如此，這些人的廩給也時常得不到保障，至崇禎七年十二月，鄒明著、孟履吉等仍自備廩給，未領分文。^①而此時修曆工作已大體告成，李天經因此再次上疏，重提此前徐光啓之請，並懇請對其中表現優異者授予欽天監職銜。其疏有云：

其曆局生儒辦事已閱五年，兩載未沾半菽，總緣戶工事例已停，即題准之特恩俱成虛願，茹苦纂緝，臣竊憐之。今書器告成，臣若不復申前請，又何以錄舊績而勵新功也？伏乞念此成勞，將生員鄒明著、程廷瑞等各量加以欽天監職銜，使與學習諸臣研究推測，以共維新法於不墮可矣。^②

但此次疏請又因鄒明著等人遭蔡孚一誣告而生變。蔡孚一原為武英殿中書房辦事，後奉命入局效力，但因李天經懇請恩敘之疏中未提其名而甚為不滿，屢次到禮部求敘，均被駁回，因而懷恨在心，誣告鄒明著“欺君蔑旨、指官囁民、豪姦大弊”之罪，告孟履吉受賄三百兩白銀，告李次彬、陳于階“千金之賊”。崇禎八年六月刑部奉旨提鄒明著和蔡孚一到部對質，最終證明蔡孚一所告之罪均為烏有。真相既明，鄒明著、程廷瑞等遂於崇禎九年正月上“覆

盆之冤已雪、加銜之旨宜遵”疏，經禮部審議，終獲實施。鄒明著以“供事六載，勤敏可嘉”，獲授欽天監正九品五官司曆職銜，而程廷瑞、孟履吉等八人獲授欽天監從九品漏刻博士職銜。^③由於已有正式職銜，在此後的官方文獻中，鄒明著也有被稱為“在局供事官”。^④

耶穌會士參與組建曆局、修改曆法，根本目的在於傳播天主教。曆局中徐光啓（崇禎六年十月去世）、李之藻（三年五月入局，九月去世）以及接替徐光啓督領曆局的李天經（崇禎七年入局）均是明末著名奉教士大夫，且已入教多年，^⑤徐光啓極力推薦入局治曆的金聲，也曾領洗入教，但金聲因故未能赴請。^⑥此外，陳于階、鄒明著等治曆骨幹也均先後領洗入教，使得曆局具有濃厚的天主教背景。德國學者魏特說“耶穌會會址之旁，人們建立寬敞房屋一所，作為教養天算專門人才學院之用。入學院之中國學員自然俱係基督教徒，在傳教士指導之下從事天算表格與對數表逐譯之工作”。^⑦曆局位於宣武門內首善書院，的確距離南堂不遠，但是若說曆局中人全部為教徒，恐需要進一步的證

① 《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27上—1629下。

② 李天經《書器告成敘錄宜加疏》（崇禎七年十二月初八日），《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31上。

① 禮部尚書黃士俊《書器告成敘錄宜加謹照原題查敘在事諸臣以示激勵疏》（崇禎九年二月二十二日），《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55上—1657下。

② 周胤《聖主留神欽若微臣敬循職掌疏》（崇禎十年九月），《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83下。

③ 徐光啓、李之藻分別領洗於1603年、1610年，而李天經亦於1630年之前領洗，教名伯多祿（Petrus）。STANDAERT, Nicolas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oston and Köln: Brill, 2001, pp. 401, 403.

④ 參見徐光啓《修曆缺員謹申前請以竣大典疏》（崇禎五年十月十一日）、《曆法修正告成書器繕治有待請以李天經任曆局疏》（崇禎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及金聲《上徐玄扈相公書》，《徐光啓全集》（9）《徐光啓詩文集》卷五，頁237—238, 242—245。關於金聲是否曾領洗入教，歷來多有爭論，但葡萄牙文資料明確記載載金聲領洗，教名小奧古斯丁（Agostinho），對此本人將另文考證。

⑤ 魏特《湯若望傳》，楊丙辰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49年，頁151。

據。不過，耶穌會的確非常重視這一修曆機構及其對傳播天主教的作用。在耶穌會中國年報中，傳教士將曆局稱為“曆法學院”(Academia do Calendario)，給予曆局特別的關注，記載了一些曆局中的官員入教的經過。但是由於沒有透露入教者的中文姓名，暫時還無法確定所記載的到底是何人。^① 可以肯定的是，傳教士利用傳授天文曆法知識之便，積極向學員宣教。鄒明著即是在傳教士的影響之下領洗入教的(詳下)，在其所繪製的《見界總星圖》上，署名為“後學鄒明著圖”，似已表明其教徒的身份。^②

崇禎十年，鄒明著辭去曆局工作，欲返回家鄉武昌。該年十二月的月食觀測名單中，已不見其名。^③ 鄒明著之所以辭職，可能是因為這時修曆工作已大體完成，但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想將天主教傳至他的家鄉，因為在這一年他的弟弟鄒明昌考中進士，這為他實現這一想法提供了條件。

三 鄒明著與武昌開教

1630年代，由於明政府在軍事與曆法方面重用徐光啓等奉教

士大夫及湯若望等耶穌會士，^①天主教在華傳播出現了蓬勃發展的態勢。在1636年的中國天主教版圖上，耶穌會已擁有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絳州、西安、開封、福州、建寧、泉州、建昌、南昌等十二個傳教駐地，分佈於中國十五省中的八個省；在華傳教的耶穌會士有二十七人，包括二十三位神父和四名修士，僅這一年便有3475人領洗。^② 除了南北直隸與沿海省份外，耶穌會傳教士已逐漸深入到山西、陝西這樣的內陸省份。但是在經濟、文化發展程度較高的湖廣，耶穌會很想建立傳教區卻一直沒有找到進入的機會。直到1637年，機會終於出現。

有關湖北開教史，康志傑有較多的研究，但所根據的多為采訪所得的口述資料，一些內容不夠準確乃至錯訛。如云崇禎七年(1634)方岳貢回鄉探親，順道將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1592—1677)帶到穀城。^③ 但何大化於崇禎九年纔由澳門到達杭州，怎麼可能在1634年進入穀城傳教？教內史家費賴之稱，何大化1636年來華，不久到杭州學習中國語言，時有兩位信奉天主教的官員，一名雅各伯(Jacobe)，一名瑪弟亞(Mathias)，兩人皆湖北武昌人，他們向時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的葡萄牙耶穌會士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7—1653)建議，派遣一名神父到家鄉傳教。於是何大化奉傅汎際之命前往武昌，於1638年1月初抵達，

① 《1637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和《1638年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中均有“曆局情況”專節，見BA, JA, 49-V-12, fls. 13-15, 284-285。

② 明末清初天主教中文文獻中，中國教徒往往會自稱“後學”或“景教後學”，例子所見多有，如李九標、張星曜等。鍾鳴旦、杜鼎克編《耶穌會羅馬檔案館明清天主教文獻》，臺北利氏學社，2002年，(七)，頁24；(九)，頁455。

③ 李天經《遵旨測驗日食敬陳完曆實著疏》(崇禎十年十二月初二)，《崇禎曆書·治曆緣起》，頁1687下—1689下。

① 關於明末在軍事上重用傳教士和奉教士大夫以抵禦滿人入侵，參見董少新、黃一農《崇禎年間援華葡兵新考》，《歷史研究》2009年第5期，頁65—86。

② 參見Antonio de Gouvea, *Cartas Anuas da China (1636, 1643 a 1649)*, ed., introdução e notas de Horácio P. de Araújo, Macau: Instituto Português do Oriente; Lisboa: Biblioteca Nacional, 1998, pp. 57-120. 按照耶穌會在遠東的行政區劃，明朝的兩廣被劃入耶穌會日本教省，因此在《耶穌會中國副省年報》中不列在兩廣建立的傳教駐地。

③ 康志傑《上主的葡萄園——鄂西北磨盤山天主教社區研究》，臺北，輔仁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2。

是為湖廣省開教之始。^①何大化在雅各伯的幫助下,得以在武昌建立傳教駐地。但這位洗名雅各伯的奉教官員到底是誰,學界從不知曉。

1638年1月1日,傅汎際神父在南昌向耶穌會日本中國巡按使李瑪諾(Emmanuel Diaz, 1559—1639)寫了一份報告,名為《1637年中國消息》,敘述了他派遣何大化到湖廣傳教的經過:

北京有一位與神父們交往頻繁的官員,離開北京前往湖廣武昌府,擔任那裏的知縣。他主動向神父們表示,希望能有一位神父前往那裏。那時北京還有一位士大夫,由於數學才能獲得官職,協助我們的神父們已七八年,與神父們有着親密的友誼。在這期間他領洗了,他總是希望能夠將聖教帶到他的家鄉。其弟於該年考中進士,這使雅各伯(我們如是稱呼那位數學官員)非常高興,便更加堅持請我派一位神父前往其家鄉,因如今其弟是進士了,能提供幫助與照應。如果以前來華的神父中無合適人選,則新來的神父亦可,因為主要工作只是照顧那裏的教徒,記述教徒們的生活,再就是召集所有教徒開適當的會議。我們在湖廣省城也有另外一些教徒,有的是費樂德(João Figueredo)神父前往那裏的時候施洗的,^②有的則是在北京領洗然後回到那裏的。我不希望錯過此次機會,便立刻從北京寫信給何大化(因為當時其他神父均不方便,而何大化剛來不久)。於是他從杭州到南京,準備在那裏等我。我們在同一天抵達南京,甚至我們差一點在城門碰見。我以隨

身攜帶的微薄之物幫助他。我離開南京前往江西後,他前往湖廣了。他於兩三天之後便抵達了湖廣省城,^①而雅各伯和教徒們已在那裏等候他了。我即將走訪更多的省份,因此希望您(巡按使)給予我們必要的幫助。^②

由此可知,這位雅各伯曾供職於曆局,另一位“與神父們交往頻繁的官員”,應該是鄒逢吉。鄒逢吉字五從,號愚谷,江西湖口人,崇禎十年進士,與鄒明昌為同年。稍後鄒逢吉被任命為武昌知縣,赴任時正趕上土寇猖亂,逢吉隨官兵剿平之。^③惟不知此人是否即為費賴之所提到的瑪弟亞。

1638年6月10日,傅汎際在南昌再次給巡按使神父寫了一份報告,題為《1637年和1638年中國傳教消息》,在該報告的最後轉述了何大化寫給他的一封信,信中何大化簡單彙報了他在湖廣最初的傳教情況:

關於湖廣省的傳教情況,這幾天收到了何大化神父的來信,他在信中這樣說道:“在湖廣傳教,對我來說是非常值得寶貴的事情,我非常願意工作於此,盡到我所有的責任,實施我所有的想法,使這裏的人對聖教睜開眼睛,這些便是我們的主業望我所做的一切了。我希望這必將成為一項光輝的事業。這些天我為官員U. Jacobe的太太、他們的一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進行了洗禮,還為他家中的其他10人做了洗禮,我經常在他的家中做彌撒,以及舉行各項聖禮。”^④

① 據何大化自己說,這一行程用了一個多月時間。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BA, JA, 49 - V - 2, p. 365.

② BA, JA, 49 - V - 12, fls. 205v - 206.

③ (光緒)《武昌縣誌》卷一,光緒十一年刊本,葉26;卷一二,葉24—25; (同治)《湖口縣誌》卷八上,同治九年刊本,葉3—4。

④ BA, JA, 49 - V - 12, fl. 216.

① 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梅乘駟、梅乘駿譯,天主教上海教區光啓社,1997年,頁251—252。

② 葡萄牙耶穌會士費樂德(1594—1642)於1631年左右到達開封,此後長期在這裏傳教,期間曾短期到湖廣傳教,但似乎沒有建立穩定的傳教駐地。費賴之《明清間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頁183—184。

值得注意的是,何大化此處指出了奉教官員雅各伯的姓氏,即U,此發音有可能是鄔、吳、武、胡等漢姓。由於傳汎際此前已提到此人的弟弟在1637年考中進士,查該年進士題名碑錄,姓武、吳、鄔者二十餘人,^①惟有鄔明昌為武昌人,故其兄雅各伯必為供職曆局的鄔明著,而雅各伯為鄔明著的洗名。

據何大化說,至1637年,鄔明著已經入教七八年了,則其領洗是在1630年入局前後。這期間在北京傳教士的有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和湯若望,若鄔明著是在北京領洗入教的,則為其洗禮的傳教士很可能是這四人中的一位。入教後的鄔明著,對天主教信仰非常虔誠,並一直希望聖教能夠傳至其家鄉。其弟鄔明昌考中進士之後,他認為明昌可以以其地位與影響為此事提供便利,於是便通過北京的傳教士向傳汎際會長提出申請,希望派遣一名耶穌會神父至武昌傳教,而他本人也辭去曆局職務,先行返回武昌,在那裏等待神父到來。^②

何大化於1637年12月從杭州出發,經過南京時與傳汎際短暫會面,獲得正式任命。他於1638年1月6日抵達武昌,這一天是天主教的主顯節,何大化認為這是個好兆頭,預示着聖教將在這一異教區域獲得發展和勝利。進入武昌後,何大化在一座山(當即武昌蛇山)上的小房子中暫時住下,度過多雪的冬季,隨後又租了房子,建起教堂。待一切安頓妥當後,為尋求當地官方的認可與保護,何大化拜見都堂,贈以隨身攜帶的歐洲禮物,獲得友好接待。在此基礎上,何大化正式展開傳教工作,並按照其他傳教駐地的形式建立起武昌駐地。^③

鄔明著的小兒子是何大化在武昌洗禮的第一人,對此他記載道:

福音在一些人的心中已深深紮根。雅各伯的兒子是一個年紀尚小的學生,也是這裏第一個接受洗禮的人,洗名依納爵(Ignacio)。一次,依納爵患病發燒,甚感難受,於是喝少許聖水,立即獲痊。^①

以耶穌會創始人聖依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 1491—1556)之名作為首個教徒的洗名,似顯示何大化對武昌駐地的未來抱有很大期望。接着,鄔明著一家人均經何氏之手洗禮入教,成為武昌第一個天主教家庭。此後,何大化在鄔明著的協助下,曾為楚王朱華奎府中一些人洗禮,利用鄉試機會在參加科考者中發展教徒,也曾前往漢陽、新洲等地傳教,不久教徒人數便超過三百人。^②

何大化在武昌的傳教工作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好景不長。自從他進入武昌後,這裏一直遭受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的騷擾與破壞,一度陷入極度混亂與匱乏之境。據何大化說,至1640年僅剩下兩名教徒,而接下來的三年饑荒,這兩名教徒也都死了。1643年,武昌遭圍攻,城內守軍亦亂作一團,肆意燒殺搶掠。鑑於情勢危急,時任耶穌會中國副省會長的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神父緊急命令何大化撤離湖廣,以免如費樂德在前一年那樣遭遇不測。^③何大化奉命撤出武昌,經九江、南昌、建寧等地,到達

① Ibid., p. 366.

② Ibid., pp. 367-369.

③ Ibid., pp. 578-579. 1642年明軍為了摧毀李自成農民軍,挖開黃河堤壩,引水淹沒開封,造成三十萬人死亡,其中包括在當地傳教的葡萄牙耶穌會士費樂德。

①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下),頁2614—2616。

② 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p. 365.

③ Antonio de Gouvea, *Asia Extrema*, segunda parte, pp. 364-366.

福州,接替艾儒略任福州駐地會長。^①但何大化沒有提及鄔明著一家人的下落,不知其是否亦在戰亂中遇難。

四 結 語

鄔明著因為是參與明末以西法修曆活動的重要成員之一,而在中國天文學史上應有一席之地;又因為他虔誠信奉天主教並積極促成武昌開教,而在中國天主教史上留有其名。幸運的是,儘管有關他的歷史文獻少之又少,但畢竟在《崇禎曆書》和葡萄牙文資料中均有數條記載,可以使我們管窺其修曆與奉教事迹。

自利瑪竇(Mathieu Ricci, 1552—1610)入華傳教以後,明末清初在華耶穌會士一直通過各種途徑,積極結交中國社會各階層(尤其是士大夫)人士,編織出一個廣泛而複雜的人際網絡。通過這一網絡,天主教在華不是以點對點,而是以由點到面乃至由面到更為廣闊的面的發散形式傳播。^②

雖然我們尚無法確定徐光啓負責募集的曆局成員中奉教者的比例,但其中的主要人物均為教徒,且從西文文獻可知,其他成員亦有不少人領洗入教。負責修曆的西局,天主教背景深厚,亦成為明末傳播天主教的一個組織。他們通過修曆工作為天主教尋求庇

護,並向內部成員宣講教義,而且通過其成員將天主教傳播到其他地區。修曆骨幹鄔明著領洗入教,並將天主教傳入家鄉武昌,便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本文作者係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員)

① 關於何大化在華傳教經歷,參見拙文《何大化與明清鼎革之際的福州天主教》,《文化雜誌》2010年秋季刊,頁151—160。

②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學界越來越重視明末清初天主教人際網絡的研究,如林金水《利瑪竇交遊人物表》,《中外關係史論叢》1985年第1期,頁117—143;林金水《艾儒略與福建士大夫交遊表》,《中外關係史論叢》1996年第5期,頁182—202;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66—129,271—272;蕭清和《明末福建天主教徒李九標交往考略》,《文化雜誌》中文版第76期,2010年,頁129—150。